

●桐城派研究

# 论姚门四杰民本思想

刘新语

(南京农业大学 人文与社会发展学院,江苏 南京 210095)

**摘 要:**桐城派文人具有极其强烈的民本思想,其中姚门四杰的民本思想表现在重民、养民、富民和教民四个方面。相对于传统民本思想,他们更多是从社会现实出发,提出了符合当时社会需要的进步思想。

**关键词:**桐城派;姚门四杰;民本思想

**中图分类号:**G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4730(2021)02-0020-05

**收稿日期:**2020-04-11

**DOI:**10.13757/j.cnki.cn34-1329/c.2021.02.004

**作者简介:**刘新语,女,安徽安庆人,南京农业大学人文与社会发展学院硕士研究生。

作为一个文学流派,桐城派在清代名震一时。姚门四杰为其一个代表。姚门四杰是指姚鼐门下学术造诣比较高的四个人,学界对于这四个人的考辨分为两种不同的说法。其一是姚莹的《惜抱先生与管异之书跋》,其文曰:“当时,异之与梅伯言、方植之、刘孟涂称‘姚门四杰’。”<sup>[1]</sup>他将管同、梅曾亮、方东树、刘开认为是姚鼐门下四大高徒。另一说法是曾国藩,他认为:“姚先生晚而主钟山书院讲席,门下著籍者,上元有管同异之、梅曾亮伯言,桐城有方东树植之,姚莹石甫。四人者,称为高第弟子。各以所得,传授徒友,往往不绝。”<sup>[2]</sup>认为姚门四杰应是管同、梅曾亮、方东树、姚莹。本文所讲的姚门四杰是指姚莹、管同、梅曾亮、方东树四人。

人们熟知姚门四杰往往是由于他们在散文诗歌方面的创作。而学界对于姚门四杰的研究更多地聚焦于其文学作品和人物生平研究。四人在文学上都提倡桐城派先辈的“义理、考证和辞章”。在此基础之上,他们还提倡文章要“因时而言”,主张经世致用,使桐城派的发展适应了当时社会发展的需要。学界对桐城派民本思想的研究则相对较少,张元的《桐城文化中的民本思想研究》<sup>[3]</sup>是为数不多的研究之一,文章介绍了桐城派代表人物的民本思想及其内涵,其中就讲到了姚莹的民本思想。卢佑诚《梅曾亮“民佣”思想述论》<sup>[4]</sup>一文则重点介绍了梅曾亮的民佣思想。陈连营《管同及其学术思想》<sup>[5]</sup>研究了管同学术上的经世致用思想倾向,特别是管同通过其文学作

品关注社会,关注人民疾苦的经世思想。未发现学界对方东树民本思想专门研究的文章,只是偶有提及,例如周中明《桐城派研究》<sup>[6]</sup>一书中对四人思想作了一个简单介绍,其中对于方东树和姚莹的介绍较为详细,但对梅曾亮和管同的介绍就相对较少。总之,从文学角度研究姚门四杰文章较多,重点关注其文学作品价值及其体现的经世致用思想,且个案研究较多,宏观研究不足。本文拟对姚门四杰的民本思想作总体研究,进而发掘其思想的重大历史价值。

## 一、以人为本的重民思想

古训云:“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sup>[7]</sup>强调民众对于国家,饮食(基本的生活保障)对于民众的极端重要性。“以民为本”的思想因此也成为历代帝王所遵循的基本价值取向。同样各个朝代的政治家、思想家也以此为基础提出自己的观点和命题。姚门四杰作为桐城派在近代的代表人物,其重民思想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 1. 民为邦本

为官时的姚莹因务实为民而广受赞颂。他说:“民气不伸,怨必积矣。”官员应该勤勤恳恳,为政务实,切实处理好人民的事情,为人民主持公道。因此,他说:“余与镇军郡守,亦各思其咎,益修政事,以伸民气而定民志,庶可寡过而安。”<sup>[8]</sup>从中可以看出,姚莹已经充分认识到民众的力量,认识到为官应将人民放在重要位置,只有民众安定,

社会才会安定。

管同也认识到“民为邦本”的真谛。林清、李文成起义,曾令清王朝统治者为之震惊。他对这次起义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和建议。他说:“国家承平百七十年矣,长吏之于民,不富不教而听其饥寒,使其冤抑,百姓之深知忠义者盖已鲜矣。天下幸无事,畏惧隐忍无敢先动,一旦有变,则乐祸而或乘以起。”为此他建议:“今日之贼,不患其聚而患其流,今日之兵,不患其战而患其守。惟人心固而后守备坚,守备坚而后贼势败。公宜告三省长官,急讲民事,利民者行之,害民者去之,其官吏之殃民者急罪而罢之。”<sup>[9]531</sup>他的这种主张一针见血地指出了社会动乱的主要根源。其原因就在于朝廷官员不了解民间实情,不关注民生,不关心老百姓的死活,还横征暴敛,加重对百姓的赋税征收,缺乏对百姓的教化,从而人民的忠义观念开始变得淡薄,一遇到起义便一哄而起。因此他建议省长官应该关注民事,将危害人民利益的去掉。

梅曾亮在《民论》中说:“当汉之盛时,凡乡射、大雉、都肆乡会,皆太守与县令亲之,犹古法也。法之废,其东汉之衰乎?嗟夫!此黄巾米贼之祸所以起而不可禁也。夫民所乐趋之事而不为利导之,草野之间,必有因民之欲窃吾意以售其奸者。”<sup>[10]3</sup>梅曾亮在这里将西汉和东汉做了一个对比,指出了西汉繁盛时期的官吏与官吏,官吏与地方百姓之间的关系是亲近的。而东汉时期则不是,农民起义不断,盗贼四起,民不聊生。究其原因人民所想要做的事情,官吏没有很好的指导人民,所以人民就起而反抗,东汉灭亡。梅曾亮在这里也表达了人民是国家的根本,只有维护好人民的利益,国家才会稳定。

方东树在他的《大意尊闻》中写道:“盖民安而后国安,国安则君自安,一定之理,若夫徒知利国而不利民,不顾民之水火疾痛,而曰吾固以利国奉君也,譬掘根焦土而求种获,必不得矣,卒之民亡而国遂受其大败。孟子曰: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此利害次第之实理也。”<sup>[11]</sup>方东树的这段话言简意赅地指出了“国家—人民—君主”三者之间的关系。只有人民安居乐业,国家才会安定,国家安定之后,君主才会安心。而且还借助孟子“民贵君轻”的思想来指出为官者关注民生,关心人民疾苦,视人民为国家根本,只有人民生活富裕,国家才会兴旺。

## 2. 治吏安民

官吏是君主治理百姓的有力助手,要使人民安居乐业,整治官吏就显得非常重要。官吏欺压百姓、横征暴敛的现象尤为突出,造成了百姓和官吏的矛盾激化,清末农民起义不断,危及社会稳定。因此,从维护王朝稳定的角度出发,姚门四杰提出了调整官民关系,处理官民矛盾,同时要求官吏清正廉洁、秉公执法。

姚莹为官清廉,为民作主,从不妄取民间一文钱财。他在平和县任知县时,“每亲临四乡,皆自出费用,即有围捕,亦以身先,未尝轻假营伍,所至不惊,民无扰攘。”<sup>[12]74</sup>所以在他离开平和县的时候,这里的百姓都非常不舍,姚莹在此任职从不拿这里百姓的一针一线,还同这里的百姓共同谋求发展,发展当地的经济,使人民的生活得到提高。他在对待官吏和人民的态度上有句名言:“为吏而曰民恶者,其人必非良吏;为将而曰兵恶者,其人必非良将。”<sup>[13]</sup>在这里他将所有的罪责全部归结于官吏而不是百姓。他还说:“官有一善,则群相播颂而悦服;官一不善,则群相诟谮而为奸欺。”<sup>[14]407</sup>他认为地方之所以有盗贼是因为官吏没有处理好与人民的关系,所有的盗贼都是由百姓流亡转化而成的。在治吏安民上,他着重强调了官吏的责任,将官吏作为矛盾的源头。

管同的《拟筹积贮书》一文,对当时朝廷粮库储备的空虚情况提出了自己的质疑,他说:“当乾隆中岁,京仓之粟陈陈相因,以数计之,盖可支二十余岁,乾隆之去今时既未远,加以数十年内未阙一州,未损一县,未加一官,未增一卒,何以曩者备二十岁而有余,今则仅支一年而不足?”<sup>[9]532</sup>在他看来,朝廷粮食储备空虚其主要的原因是上层贵族官吏的腐败贪污和寄生阶层的膨胀所造成的。要想解决这个问题就要从贵族官吏出发,裁减匠役,减少王侯子孙的俸禄,以此来解决这个问题。管同还看到了清王朝在军事上的弊端,他说清政府对于士兵的训练不够,使士兵在国家遇难的时候,拿起武器却不知道如何使用,打起仗来都畏手畏脚。面对这一惨状,管同提出国家统治者应该要加强士兵的军事训练,否则军队颓废,士兵临阵脱逃的现象将会成为一种常态。

梅曾亮在他的《柏枧山房诗文集》中说到,“循吏者,心乎民而已。”<sup>[10]162</sup>即在朝为官者要时时刻刻心系百姓,将百姓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不应该有一己之私。其实在他的文学作品中我们处处可见他

的惠民、忧民的思想。如在《题还珠图》中梅曾亮满怀深情地讲述了同年黄宅中为贫民竭尽心志办实事的故事。《和涛冰词乐府书后》记载朱尚斋在宣城时遇水灾,如何救灾的事。《黔记序》记山阳李芝龄先生阻丈田事,就是忧民的实例。他在《栗恭勤公家传》中说:“遇灾年,放税振谷,以实惠民,不以上官意为损益。”<sup>[10]200</sup>这些实例无不表现了梅曾亮关注社会,关心人民疾苦的民本思想。

方东树一生虽然没有考取功名,但是却无时无刻不在关注着“国计民生”。他对当时腐朽衰败的统治进行了尖锐的批判。他不仅对朝廷吏治腐败问题进行抨击,而且就科举、漕运、边防、军事等众多方面予以揭露批判,并就这一系列问题提出自己的建议,希望得到朝廷的重视。在学问上,他对文人士大夫提出了做文章不在于追求辞藻完美,也不在于追求训诂考据,而在于关注社会现实,关注国计民生。对于社会中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都要成为他们关注点。通过对这些问题的解决从而达到国泰民安。

## 二、勤政为民的养民思想

“德惟善政,政在养民。”<sup>[15]</sup>这是《尚书·大禹谟》中的一句话。它强调养育民众是君主的一项重要政事。养育民众是统治者得到民心的重要方法,也是国家安定的基础。只有人民衣食无忧,社会才能安定和谐。朱元璋曾说“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此有国家者,所以厚民生而重民命也。”<sup>[17]</sup>民生问题是统治者保持国家长治久安的根本问题。姚门四杰更是从行政实践方面践行传统养民思想并有所发展。

姚莹在噶玛兰任职期间,在经济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政策,“包括田园赋复奏核定;建造城垣衙署,取用民人田园,应换给埔地;奏销限期,应照部议奏定;仓谷储备二万石;加留余埔番租,官应为经理;设防隘守生番;东势未垦顶、二结鹿埔等地,应请暂免报升,以纾民困;西势未垦地,应请缓报升科;民人承种田园,毋庸换给司照以苏民困等等。”<sup>[16]</sup>这一系列经济措施,使噶玛兰地区的经济得到了较快的发展,使人民摆脱了原始的生活。解决了人民的温饱问题,也改善了当地野蛮的民风民俗,破除封建迷信,使人民得到很好的教化。

对于清朝台湾移民中的游民问题,姚莹通过实地考察,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提出了联庄收养

游民的政策。他让本庄的游民登记造册,让体壮者保护本庄的安全,巡守本庄,体弱者从事雇工,看守田园门户。让本庄之人供给饭食,凑钱收养游民,而非官府出资本供养。这就实现了以民养民,以工代赈,从而解决了游民温饱问题,从根本上消除了台湾游民现象。

嘉庆道光年间,各地农民起义不断发生,自然灾害也使下层民众的生活苦不堪言。面对当时的社会现状,清王朝自身也深感精疲力竭。针对天灾人祸,管同认为统治者应该提高自身的修养,反省自身的失误,来解决这些问题。而士大夫更应该挺身而出,不应该说这是上天的安排,和我没有关系。“夫有灾而必以闻着,督抚之责也;救荒而必尽其力者,州县之任也。”<sup>[17]</sup>国家有难匹夫有责,我们每个人都有责任和义务为国效力,关注民生,体察民情。救荒就是养民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养民说到底就是让人民安居乐业,生活富裕。而灾荒则使人民流离失所,无家可归。所以,不论你是为政者还是文人,都应该有责任去帮助那些水深火热之中的人民。

梅曾亮作《和涛冰词乐府书后》记载朱尚斋在宣城时遇水灾,如何救灾的事:“君甫视事月余,即出己财,具钱帛、糗粮、藁席,联数舟为一大舰,分棹小舟百余,亲率吏役,冒甚雨,入惊涛中……于是,富者皆出财具舟,各救其所近地。及雨止,民四出。则立法,禁剽掠,按老弱。请上官以发国帑,出廉俸以募富民。凡立厂散米给钱,如古循吏,法皆备。”<sup>[10]93</sup>这段文字详细的描述了宣城遭遇水灾时,地方官吏带头积极组织抢险赈灾工作的场面,这段记述生动而且给人一种极强的画面感。这不仅仅表现了梅曾亮的文学造诣高而且也可以看出他通过记载这件事,来表达他关注人民疾苦,用文章来表达他对于朱尚斋的敬佩之情和赞美之意。

道光十一年(1831年),桐城地区发生特大水灾,当地灾情非常的严重,不少百姓背井离乡,生活无依。当地县令杨大缙是一大贪官,趁着灾情时期,变本加厉搜刮民财。百姓苦不堪言,忍受不了如此沉重的赋税,当地百姓蜂拥而起,围困县衙,声言要驱逐杨大缙出境。杨大缙这时感到非常害怕,担心百姓真的造反,所以他以百姓骚乱为由,上报幕府,请求派兵镇压。那个时候,方东树正在邓廷桢幕府,向邓廷桢陈述实情,并陈说利害,且以身家性命担保。邓廷桢非常敬重方东树,责备杨大缙并要求他要安抚灾民,妥善处理,事态



始得平息。方东树虽是一介寒儒,但却忧国忧民,关注民生疾苦,敢于建言献策。

### 三、工商皆本的富民思想

谋求财富是人之本性,每个人都有追求财富的欲望和权利。富有了,人民才能更好地赡养父母,养育子女,给予他们更好的生活。追求财富是人民的权利,富民则是富国的基础。只有人民富裕了国家才会富强。保证人民的利益,使人民富裕就是民本思想的一个重要内容。

姚莹认为,社会要想长治久安,就要想办法让人民富裕,这才是地方行政之根本。他提出工商皆本的进步思想,认为工、农、商三业均可达到使人民富裕的效果,而统治者要想长治久安则必须发展各业。他说古代有智谋的人都知道“保民而后有赋,保商而后有税”<sup>[12]139</sup>,作为统治者更应该知道这个道理了。试问如果人民生活困苦,商业发展困难,那国家的赋税从哪里来呢?为此,他还从贸易、乐业、矜尚和货财四个方面提出了自己的对策。他说:“民好贸易,而我市廛不惊;民好乐业,而我闾阎不扰;民好矜尚,而我待之以礼;民好货财,而我守之以廉,其同民之好也如此。”<sup>[14]407</sup>并且要求统治者重视和扶持工商业发展,改变重农抑商的社会风气,鼓励更多的人从事商业。姚莹说:“今欲治之,必先富之。”<sup>[18]</sup>而富民之道,“一曰树艺,二曰贸迁”,即指农耕与贸易。他主张“去五耗”,即奢淫、词讼、械斗、乱逆、盗贼五件,认为“去其五耗,民乃可生,生得其养,比及十年,富将可复”<sup>[19]</sup>。他在台湾的噶玛兰地区担任通判期间的治理同样是他富民思想的很好体现,他通过帮助当地人民整顿土地,利用当地的自然资源樟树来发展樟脑丸,进行贸易发展经济,使当地的人民富裕起来。人民一旦富裕,就会发展当地的教育,以此来改变当地彪悍和野蛮的民风民俗。不得不说姚莹的思想在当时那个时代是超前的、进步的,是符合历史发展潮流的。

管同在他的《禁用洋货议》一文中,也提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他说:“天下之财统此数,今上不在国,下不在民,此县贫而彼州不闻其富,若是者何与?曰:‘生齿日繁,淫侈愈甚,积于官吏,而兼并于大商,此国与民所以并困也。’虽然,是固然矣,而犹有未尽。”<sup>[20]6-7</sup>他认为西方列强的商品大量进入中国市场,所以造成了中国商品的市场萎缩。

因此他主张禁用洋货来恢复中国商品的市场。中国人民在清末之所以出现百姓饥寒交迫,民不聊生,这一重要原因就是洋货的输入,由于洋货便宜而且好看,所以导致中国本土的商品受到排挤。中国的白银大量流入外国市场,中国人民怎么能富裕呢?虽然他的主张还是站在一个封建士大夫的角度来看的。但是不得不说,他的眼光比同时代的人已经超前了很多。他的爱国情感在他的作品中能够深深地感受到。

### 四、追求礼义的教民思想

政以治民,礼以教民。民本思想认为,在人民达到温饱之后,接下来就是用儒家的道德原则和规范去教化人民,这就是先富而后教的儒家民本思想。在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家,如何使统治者牢牢地控制着基层民众这是一个重大问题。明清时期统治者践行着“治国以教化为先,教化以学校为本”的教民思想。

姚莹作为当朝官员,他每到一个地方任职的时候,都十分重视文化教育,注意摒弃当地的封建迷信和陋习。只要是他任职的地方,都会建立学校,督促士人学习知识,以提高当地人的文化思想。姚莹任龙溪县县令时,就大力兴办教育。他不仅自己拿出家财来修建学校,而且还规劝富民捐款来修缮书院,以供祭典和学习之用。在出任台湾县知县和噶玛兰通判时,他不仅通过劝诫当地富民进行捐款、筹款去修建台湾当地的学府书院,而且还聘请当地的知名人士去管理和主持,这些措施都有利于当地教育事业的发展。姚莹还对迷信中的害人活动进行论理。台南人素有“五妖之崇”,民众受其伤害颇深。因此他写有《焚五妖神像判》,对五妖神像大加批判。噶玛兰受台风袭击,嘉义发生地震,他都告诉大家这不是鬼神作祟,而是一种自然现象。

管同生活的社会自然灾害频发,民生艰难,社会急剧动荡。所谓“国与民皆患贫,奸伪日滋,祸乱相继,士习益漓,民心益竞”<sup>[21]</sup>。他针对当时的社会现状,提出著名的论断,“世事之颓,由于吏治;吏治之坏,根于士风;士风之衰,起于不知教化。”<sup>[22]</sup>他把这些都归结于社会教化不振。对于农民起义,他提出人民之所以起而造反是因为百姓的教养出现了问题。他说为什么上古时期不禁止百姓的兵器却没有人群起造反。而自秦二世之

后,焚毁人民的武器锄具,人民还是会出现造反的情况。管同说:“夫善防民者,亦顾其教养如何而已。舍教养而防以法禁,如秦人者,其所见与儿童何异?”<sup>[20]</sup><sup>[427]</sup>原因是人民缺乏教养所导致的。“天下之安危,系乎风俗,而正风俗者必兴教化。”<sup>[20]</sup><sup>[424]</sup>在管同看来,“兴教化”并非是一件迂腐不可为之事,他说:“教化之事有实有文,用其文则迂而甚难,用其实则不迂而易。”<sup>[20]</sup><sup>[424]</sup>

鸦片对中国社会的危害除了林则徐、魏源等一些开明人士认识到,方东树同样很早就认识到它的危害。他在《劝戒食鸦片文》中指出鸦片的危害有三点。一是对中国的商品市场造成巨大的冲击,影响国内的经济稳定。二是对国人的身体健康造成危害,国家日渐衰落。三是有亡国灭种的危险。因此,他呼吁朝廷禁止鸦片在中国的贸易,希望以此来唤醒民众的意识。但鸦片仍然在中国社会泛滥,贵族官吏对其爱不释手。方东树特撰《化民正俗对》,向两广总督邓廷桢提出建议,设立法律严禁官民吸食鸦片,且谋划了具体措施。他希望通过他的文章可以教化百姓和官吏,但由于清政府采取妥协投降政策,根本不理睬他的意见,因此他写下了《病榻罪言》,字里行间洋溢着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怀。

## 五、结 语

中国传统社会的民本思想经过两千多年的洗涤流传下来,体现了传统思想家和政治家对人民的重视,说明传统的儒家思想对中国社会的影响极其深远。桐城派作为清代最大的文学流派,姚门四杰是一个代表,从中可以看到,在中国古代士大夫眼中并不是两耳不闻窗外事,他们关注社会现实,尤

其关注民生疾苦,并为社会发展积极建言献策。

## [参 考 文 献]

- [1]姚莹. 中复堂全集:第51—60册[M]. 台北:文海出版社,1974:878.
- [2]曾国藩. 曾国藩诗文集[M]. 王澧华,校点.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285.
- [3]张元. 桐城文化中的民本思想研究[J]. 安徽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3(1):10-16.
- [4]卢佑诚. 梅曾亮“民佣”思想述论[J]. 盐城师范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8(2):44-47.
- [5]陈连营. 管同及其学术思想[J]. 故宫博物院院刊,2003(5):7-14.
- [6]周中明. 桐城派研究[M]. 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99:264-311
- [7]马经. 中国政治思想史论纲[M]. 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04:121.
- [8]严云绶,施立业,江小角. 桐城派名家文集:6•姚莹卷[M]. 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14:167.
- [9]朱诚如. 清朝通史[M]. 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3
- [10]梅曾亮. 柏枧山房诗文集[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 [11]周中明. 姚鼐研究[M]. 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13:421.
- [12]施立业. 姚莹年谱[M]. 合肥:黄山书社,2004.
- [13]姚莹. 东槎纪略:卷4[M]//复笛楼师言(中国)台湾兵事第二书. 合肥:黄山书社,1990:77.
- [14]姚莹. 东溟文集:卷4[M]//答李信斋论台湾治事书. 台北:文海出版社,1974.
- [15]黄怀信. 尚书注训[M]. 济南:齐鲁书社,2002:36.
- [16]张崇根,刘元如.(中国)台湾少数民族研究论丛:第七卷[M]. 北京:民族出版社,2007:88.
- [17]管同. 原灾[M]. 上海:图书集成局,1888:1.
- [18]龚书铎. 清代学术史[M]. 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14:397.
- [19]姚莹. 东溟文后集:卷6[M]//与汤海秋书. 台北:文海出版社,1974:695.
- [20]管同. 因寄轩文初集[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 [21]欧阳兆熊,金安清. 水窗春吃:卷下[M]. 北京:中华书局,1984:33.
- [22]梅向东,李波. 桐城派学术文化[M]. 合肥: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2011:176.

责任编辑:陈寿富

# On People-Oriented Thought About Four Outstanding Students of Yao Nai

LIU Xinyu

(College of Huamnities and Social Development, Nanji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5, Jiangsu)

**Abstract:** The scholars of Tongcheng school have extremely strong people-oriented thought, among which the people-oriented thought of four outstanding Yao Nai's students is reflected in four aspects: valuing people, supporting people, enriching people and educating people. Compared with the traditional people-oriented thought, they put forward the progressive thought in line with the social needs at that time from the social reality.

**Key Words:** Tongcheng School, four outstanding students of Yao Nai, people-oriented thought